

目 录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	1
二、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	10
三、努力提高有效制度和政策供给能力.....	16
四、“七一”讲话解读 透视社会焦虑症	
——访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	21
五、解读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精神.....	28
六、中国道路与党的创新精神.....	4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

石仲泉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了我们党 90 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总结了 90 年来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瞻望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贯穿讲话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即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成立；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程，为探索这条复兴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今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七一”讲话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纲领性文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基础

党的 90 年奋斗历程，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取得了三大成就。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把党 90 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成就，概括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把它们视为改革开放 30 年的阶段性成就认识的。“七一”讲话把这三大成就，放在整个 90 年的历程中来论述，作为 90 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成果来说明。不仅对道路、理论体系的阐述更加明晰了，同时所增加的“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讲过的新内容和新说法、新观点。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很清晰：先有实践道路的探索，然后总结经验形成理论体系；这两者的物化和固化结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呢？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是：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基本的社会制度。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产主义。上个世纪 50 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以后就是不断调整、改革、丰富和完善的问题。

过去讲社会主义制度，往往只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成果来论述；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成果没有展开说明。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它更加完善，也更具中国特色，已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就需要把它作为党 90 年奋斗、创造、积累起来的社会制度形态来加以表述。我们党开辟的道路和形成的理论体系，就是要使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和发展，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生活、工作，去创造新的业绩，实现更美好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更加丰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的提出，对今后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民主政治，不是要把已经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丢在一边，另起炉灶，而是使其进一步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使基于政治体制改革来发展民主政治的方向更加明确。不仅如此，就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来说，不断坚持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制度基础。

紧紧依靠人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七一”讲话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更加凸显党和人民的关系，强调要把人民放在党员心中的最高位置。

——一是在讲党的历程三个时期干的“三件大事”时，每个时期干的每件大事都用了“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这个表述；并且最后结束讲话时还强调“90 年来，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依靠人民共

同奋斗的结果，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二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论述了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四个根本点，第二条就是“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是在论述必须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时，强调“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坚持这个崇高原则，为一切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的人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

——四是在论述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时，强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各级干部要“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五是在论述必须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时，更加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七一”讲话为什么这么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地位呢？这是因为：

第一，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它的核心就是群众史观。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一再谆谆教导：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第二，这是党的 90 年历史的一条根本经验。我们党取得成功的经验很多，可以从不同层面分析。如果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党取得伟大成就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源泉，那么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则是党取得伟大成就的群众基

基础和力量源泉。胡锦涛同志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第三，这是针对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而着重强调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毫无疑问，党的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没有党的建设的伟大成就，国家的发展进步就不可能有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同时也要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新挑战。这就是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和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四大危险说到底，最根本的是脱离群众的危险。特别是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的情况下，如果易发、高发的腐败势头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水可载舟，水亦覆舟”的古训，应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鸣警钟。

怎么预防四大危险、迎战四大考验？除了加强其他诸多方面的努力外，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而言，一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记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二是必须培养和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胡锦涛同志说得好：“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这是充满了对人民群众深厚的热爱之情才能说出的话。共产党员有了这种感情，才能心甘情愿地去做人民的孺子牛。三是必须真正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四是改进工作方法，“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

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每一个共产党员真正把人民放在自己心中最高位置，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不仅党的执政基础会更加巩固，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会增添新的活力。

第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充分表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再是一句只具鼓舞人心意义的口号，而已逐渐成为我们党振兴中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之后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他在 3 年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谈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时，重申了邓小平讲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思想。这就是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际上是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同步的过程。怎么实现它，只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是一个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不断接力奋斗的愚公移山工程。所以，“七一”讲话指出：“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也要靠艰苦奋斗去开创、去实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长期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

基于上述几点，“七一”讲话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的决定性作用，既在情理之中，又是现实和未来发展进步的需要。

由此我想到，目前比较流行的“感恩”之语。庆祝党的 90 岁生日，群众发自内心的呼喊，要感党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国家开始走向富强，中华民族的影响力空前提高了。“感党恩”是群众对党的热爱之情的一种表达。我以为，这个时候，我们党也要有感人民群众之恩的表达。过去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时，人民群众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回之以“人民万岁”！这可视作互相“感恩”原生态。今天，人民群众喊“感党恩”，我们党

也应回应以“感民恩”。因为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奉献和牺牲，我们党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取得建设的成就，也不可能创造改革开放的伟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努力，我们国家不可能由过去的积贫积弱，一跃而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这样震惊世界的成就。因此，“感恩”应是相互的、两方面的。特别是在基层和一线工作的党员干部，还要转变过去老百姓把地方领导看成是“父母官”的封建意识，树立“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的观念，不仅要感老百姓作出巨大的奉献乃至牺牲之恩，还要感衣食父母之恩。“民感党恩”，“党感民恩”，只有相互感恩，党和人民群众才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血肉联系才能不可分地始终保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这里讲的树立“感民恩”意识，乃其中的应有之意。

聚集优秀人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直重视人才问题。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自己还未出来工作之前就已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在党内造成这种空气。恢复工作后不断强调：“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他认为，全社会只有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科学技术才能发展起来，我们的经济建设才能发展起来。江泽民在世纪交替之际就提出：在社会的各种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科技创新问题，说到底人才问题。我们的事业能否取得成功，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掌握主动权，关键在人才。“十六大”报告，在邓小平讲的“三个尊重”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尊重”。即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四个尊重”，充分说明我们党要同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那种不尊重脑力劳动、不尊重书本知识、不尊重优秀人才、不尊重发明创造的现象彻底决裂，也表明我们党要发展先进生

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巨大决心。“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高度重视人才问题。

这次“七一”讲话，将过去对人才问题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强调人才问题关系民族复兴的伟业，是党和国家未来发展进步的战略支点，更加明确提出要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要看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更要看能不能让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其次，强调这样的优秀人才，应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永远忠诚于党和人民的。胡锦涛同志说：在选拔人才时，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具有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品质。再次，特别强调了大力培养造就优秀年轻干部的重要性。他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我们党的创始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从青年时代就满腔热血参加了党，决心为党和人民奋斗终生的。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 90 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因此，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薪火相传的根本大计，是关系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能否实现的根本大计。并且，“七一”讲话在最后寄语青年时，还引用李大钊讲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勉励广大青年在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无疑聚集了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大批优秀人才。现在有 8000 多万党员，不好妄说我们党聚集了中华民族的所有优秀人才，但改革开放 30 多年取得的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能够说明我们党聚集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优秀人才。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

目标，我们党还需要聚集更多的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使我们党更能体现它的先进性，更能发挥先锋队作用，成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脊梁。

理论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

“七一”讲话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但是，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这一过程必将为理论创新开辟广阔前景。“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据此，“七一”讲话就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回答和新的理论概括。

理论创新是多层面的。有属于指导思想层面的宏观的理论创新，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创新。也有属于着重对某个领域提出的、但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姑且视为中观层面的理论创新，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

还有讲某个问题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提法等，这就更多了，都可看作属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创新。当前，一方面需要将已经进行的各个层面的理论创新努力转化为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即将理论创新提出的问题落到实处，发挥更大的实实在在的效用；另一方面，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如人们普遍关注的民主政治建设，“七一”讲话在充分肯定我们党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在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这主要有三点：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三是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这就需要理论创新提供科学指导，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胡锦涛同志坚定地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也必然会继续向前推进，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90年求索复兴，90年壮丽征程。中华民族复兴的阶段性成就已彪炳史册，完全实现奋斗目标的路还任重道远。中国共产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卫兴华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是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会涉及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基础性问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即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包括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和作为公有制重要组成部分的集体经济，也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

我国的国有经济是由国家代表全社会掌握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制形式，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它代表国家和全民的利益，掌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致力于发展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掌握国民经济命脉。我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同时发展私营、个体、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私有制经济不是搞私有化，搞不搞私有化的标志，要看是不是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主导”是指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引导、

导向、带领的作用，它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数量比重并不一定要占多数。

“主体”则不同，既要有量的优势，又要有质的优势。量的优势是指从资产占有量、GDP 贡献、产值、新增加值等方面看，公有制经济在比重上应占优势。质的优势应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要把公有制经济搞好搞活，使国有经济有效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其在经济发展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应在发展生产力、应对国际竞争与危机、保障国家安全、保证社会进步与稳定、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任务与目的中，表现出其优越性。

在我国现阶段，根据我国国情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既要重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又要重视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划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的公有制的界限。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正是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下，我国经济与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当前，对唱衰和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私有化思潮的消极影响应高度重视。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澄清一些理论认识上的是非。

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

人们一般讲：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样讲也不错，但没有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回答，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实行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问题并非人人都很清楚。如果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就会产生邓小平提出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清的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强调公有制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公有制

为主体，是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目的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与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从本质上说，搞社会主义，搞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其目的和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公有制正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安排和必要条件。由此出发，搞社会主义，搞公有制，必须抓两头，一头是快速发展生产力，一头是共同富裕。这一思想，从马、恩、列到邓小平是一以贯之的。

从历史事实来看，沙皇俄国原是一个在经济上落后于美国的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迅速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美国在 1901 年 - 1929 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不过 4%，1955 年的国民收入只为 1917 年的 2.66 倍。而苏联 1957 年的工业增加值与 1913 年相比，增加了 32 倍，国民收入增加了 18 倍左右。二战后，尽管苏联在战争中受到重创，但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经济，成为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而苏联解体，转向私有化后，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昔日雄风不再，由远胜于中国的世界强国倒退为经济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

解放前的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贫穷的衰弱国家。成人文盲率高达 80%，人均寿命只有 35 岁左右。新中国建立前的一百多年中，多种私有制经济的存在没有导致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反而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经济社会趋于停滞与衰退。解放后，建立了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获得解放与发展。改革开放前，尽管受到“左”的损害，公有制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但由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压迫与剥削，经济增长还是比较显著的，处于世界前列，在较短时期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其成就超过了过去几百年，这种成就主要依靠国有经济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又远远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期。

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真实地位与作用

有人将资本主义国家搞国有经济的状况作为我国国有经济的参照系，这混淆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即使不搞国有企业也不会损害资本主义一根毫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国有企业并不是属于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而是出于调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需要，是为了弥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缺陷，便于实行政府调控。这类国有企业一般是私人资本不愿或无力经营的部门。而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第一，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构成要素。它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方面支撑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只有坚持和完善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才能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第二，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更为有效地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兹举一例：日本这次强震引发福岛核电站危机，使关东地区产生电荒。日本不能从全国调剂电力，因为国家不掌握电力，关西的大阪电力和关东的东京电力两大电网无法并网。而我国的大电网可全国调配。第三，国有经济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要依靠和发展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第四，国有经济是保证我国经济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应对国际竞争和突发事件、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能够首先摆脱危机的冲击，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国有经济功不可没。第五，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手段。有些人认为私有制经济是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有人咒骂国有企业，断言国有企业“造成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法治的破坏、民生的困难、腐败的蔓延、道德的沉沦”，因而国有企业“不是政权的基础”，这实在是无理强加于国有企业的罪责。国有企业固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机制解决，但这不是国有企业的制度性问题，而是需要实行科学管理的问题。之所以

强调包括国有经济的公有制经济是党和政府执政的经济基础，是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按劳分配、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如果是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就不需要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是非社会主义经济，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使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外资经济和私营企业，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其发展。但如果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丧失了，上层建筑迟早会随之变化。

国有经济的效率及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

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经常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指责。如果国有资产增长快了，利润率大幅提高了，会被指责“国进民退”，挤压了非公经济，甚至说是明盈实亏。如果利润率低了，又被说成是低效率，国有不如私有，主张“国退民进”。最近看到有人用统计数字批评国企“近几年国进民退，国有资产从1999年9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3万亿元，是十年前的五倍”，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论断。

对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与私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只有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理念和要求去考虑与研究，才会得出科学的认识。只根据国有资产十年增加五倍，就认为是“国进民退”，这是一种片面的武断之词。国有资产的绝对量增加并不是靠挤压私有制经济取得的，与私人资本更快的增长相比，国有资产的相对量是降低的。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看，2004年-2008年，国有资产在全国资产所占比重中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而私营企业增加了3.3个百分点。多年来，国有工业资产在全国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从2002年的近70%下降到2008年的43.7%。

断言国有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也是违反事实的。国有企业承担着社会责任，不是只以盈利为目的。即使如此，通过改革，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的利税率还是很高的。2002年-2008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从2633亿元增加到9063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达8151.2亿元，同比增长17.1%。从上缴税金来看，全国国企上缴的税金由2005年的1.2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3万亿元，年均增长12.7%。根据有关单位从综合统计数字的分析看出，2003年-2008年间，国企税费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以上。截至2009年底，已有1561多亿元的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划归社保基金，使国企收益供全民共享。

总之，我们应坚持和完善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真正做到公有制和非公有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不应依靠贬损国有经济来否定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而应不断以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长治久安。

努力提高有效制度和政策供给能力

桑玉成

胡锦涛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在回顾总结党的发展和党的伟业的同时，也告诫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七一”重要讲话的这个精辟论述，深刻分析了我们党在走过90年的光辉道路之后进一步继往开来、创造辉煌的现实基础和条件。这个基础和条件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党如何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二是党如何克服和战胜自身存在的弊端和问题。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从更具有现实性的角度来看，就是如何在执政的条件下，不断提高有效制度和有效政策的供给能力问题。

正视供给有效制度和有效政策的能力不足

制度和政策都是国家治理中的基本工具。尽管制度和政策的含义、范围有所不同，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却具有基本同一的指向，即它们都是一整套经过精心设计和规划的或者经过长期实践得以形成的、并且得到广泛认同、尊重和遵守的，以及能够有效解决问题达成目标的行为规范、依据和准则。一个国家的制度化程度，是衡量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其执政水平的直接体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年特别是执政 60 多年以来，探索创设了一整套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国情的制度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七一”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是我们继续供给有效制度和有效政策的必要基础。

但是，由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正面临着四个方面的考验，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危险。经受这些考验、规避这些危险，需要我们作出很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正是需要我们努力提高有效制度和有效政策的供给能力。近年来，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等的情势变化，给我们的有效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带来了严峻挑战。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无论是针对宏观问题还是针对微观问题，有些过去一如既往使用的手段今天突然变得不那么好使了，有些过去一以贯之使用的办法今天也不是那么有效了。总之一句话，我们供给有效制度和有效政策的能力不足了。

具体分析起来，如下一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注意：

一是制度和政策的认同性不足。有效制度和有效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及基本前提，就是其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和支持度。近年来，我们制定的一些制度和政策，之所以难以取得理想成效，就与其本身缺乏广泛的认同基础不无关系。其深层原因，是由于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分化，使得社会本身缺乏共同的利益观以及基于共同利益观基础上的价值认同。于是在实际进程中，对于同一制度和政策的意见分歧甚至冲突就在所难免。譬如，关于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对于其内容、必要性等等，往往缺乏必要的社会共识。

二是制度和政策的执行力不足。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和政策只有通过其切实的执行，才能达到其设计的目标。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

有些适时的制度和政策，由于缺乏执行力，仅仅停留在文本或形式的意义上。多年来一直引起关注的“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由于执行中的问题，在客观上影响了制度和政策的效力。

三是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不足。一些制度和政策即使执行了，也不能达到其预期效果，这是制度和政策有效性不足的表现。研究表明，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抑制腐败之风的蔓延，仅以中纪委、中央监察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单独或者联合发布的有关反腐倡廉的规范性文件，至少有 300 多种，其中一些规定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

上述情况表明，必须正视确实存在的有效制度和有效政策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如在客观方面，是因为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在主观方面，我们在积极应对这些深刻变化方面所需要的精神、价值、知识以及能力等都存在偏差或者不足。

如何提高有效制度和有效政策的供给能力

努力提高有效制度和有效政策的供给能力，是党和政府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思考：

首先是主体的提升与完善问题。制度与政策的提供是否有效，必然与制度和政策的设计、规划及执行者有关。原则上说，所谓主体的提升与完善，包括两方面基本内容：

一是主体的认同性。认同性的问题，在政治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认同性，是指较为多数的相关人表示出对其制度或政策供给主体的赞同和支持的倾向。研究表明，广泛并高度的认同性是一国或一地之法律、制度、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基础。比如，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部门，如果大多数职工非常认同其主管领导，那么这个领导

的所有指令和号召就会得到有效执行。可以说，主体具有高度的认同性，其管理的成本就会降低，管理的成效就会提高。

二是主体的综合素养基础。大凡有效制度和有效政策的主体，需要具备价值、知识、智慧、技艺四位一体的良好素养。价值决定着制度和政策供给的方向，也直接影响到制度和政策的认同基础。在政治实践中，很多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之所以没有成效甚至产生负成效，除了价值偏离之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是由于知识的缺乏导致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面对复杂的社会情势，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尤其需要深厚的政治知识和相关业务知识基础。

其次是要注重程序科学的问题。有效的制度供给与政策供给需要基于这种制度和政策的“产出规范”问题。如何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政策议题的提出、讨论与论证、决策以及跟踪修正的程序，是保证其有效性的技术基础。从政治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认同规范程序的倾向一般总是强于制度和政策或者其提供者本身。譬如，一项关于收入分配的政策，只要其具有规范的并且获得广泛认同的“产出程序”，就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认同度；反之，如果其“产出程序”不科学不合理，而不管其内容如何，也有可能得不到较高的认同。最近媒体披露的有关成都“听证专业户”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

有效制度和政策的产出程序包括提案程序、论证程序、抉择程序等主要程序。这些程序还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制度程序和技术程序。所谓制度程序，主要是指基于一定价值取向并经过预设的规范，譬如说谁有资格提出议案以及谁有权力作出决断等。根据首长制原则，一个组织的行政首长具有这个组织管辖范围内所有事项的决断权力和责任。而在委员会体制下，一项制度或政策的产出，需要以该委员会成员过半数或 2/3 多数的支持为依据。所谓技术程序，即包括了提案、

讨论或论证、抉择等方法。遵循既定的制度程序和技术程序，是有效制度和政策供给的必要基础。

第三是关于注重研究的问题。制度和政策的供给属于政治决策的领域。近代英国思想家斯图亚特·密尔曾对政治决策的要义作过精辟论述，认为任何政治决策，如果能够克服或者说有效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会是非常成功的。这两个问题，第一是自利，第二是无知。就是说，无论是制度与政策供给者的自利倾向，还是其知识的缺乏，都会导致制度和政策供给的失败。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避免供给者自利倾向，需要主体的提升与完善，另一方面要解决供给者知识有限问题，建立健全完善的研究、咨询与参谋体系，加强对于制度和政策供给行为的研究，充分借助外脑的作用。

（作者系上海市社联党组副书记、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

“七一”讲话解读——透视社会焦虑症

——访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

怎么看待当下社会普遍出现的焦虑情绪？焦虑情绪产生的原因何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显示出哪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如何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国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近日，为回答读者的种种困惑，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接受了《思想者》的采访。

社会焦虑情绪说明了什么？

记者：近来，大家常常感到当下的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焦虑情绪——从不久前“达芬奇”假家具的闹剧到小商贩往“萨其马”糕点中加入有毒硼砂；从地铁滚梯事故初现到高铁事故频发，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为食品安全、出行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负面报道大伤脑筋……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吴忠民：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从历史上看，除了战乱年代，人们没有像现在如此之焦虑过；往以后看，以后人们也会焦虑，但社会焦虑的波及面和强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记者：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焦虑，显然是对社会生活中的高房价、高物价、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如果您排个序，您认为，老

百姓最焦虑的问题是哪个？

吴忠民：每年的情况略有差别。但你恐怕已经看到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部位。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焦虑情绪？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现代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记者：按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从整体上看，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但为什么社会焦虑现象反倒出现了？

吴忠民：我以为，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

记者：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因此，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焦虑。

吴忠民：是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摒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

的时间内，由于过于追求 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记者：您认为，最能反映民生状况的尺度是……

吴忠民：尺度是多方面的。比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准、最终消费率状况，等等。像公共服务问题有很多人谈过了。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最终消费率问题。这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逐渐走低。最终消费率是一个能够反映民生总体状况的重要指标。2009 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 48%（1979 年为 64.4%）。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影响到民众对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记者：您觉得社会焦虑对于社会会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吴忠民：不利影响很多。社会焦虑会引发一些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出现，会大面积降低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本土化”特征

记者：有学者认为，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后，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相对贫困人口扎了堆儿断了炊，大伙儿怎能不焦虑呢？

您怎么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能否概括一下它的特征或特点？

吴忠民：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

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其一，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巨量的事情，必然会造成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

其三，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国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对民众影响巨大：民众空前重视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虽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但在近期内客观上势必会对一些有碍于以人为本理念实现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形成不满，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其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等等。这些隐患进而会同民众形成抵触。

所以，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吗

记者：我们知道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些后发国家步入中等发展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很快就盛极而衰；在这一阶段，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和社会都受到严峻的考验。请问，作为后发国家的我们，能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吗？

吴忠民：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共同体——其人数规模比欧洲、美国、日本三大共同体总合还要大的国家来说，我们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发展面的优势，即：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的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二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

记者：您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讲讲中国能够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吴忠民：首先人心普遍思定。中国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其次，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害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这方面，2003

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都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务实、平和、宽容精神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而且，由于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

第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比如，中国的房价飞涨，大批年轻人依靠自己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所以其中的许多人是依靠父母和祖父母的帮助购买住房。类似生活困境的缓解，能够使受到家人帮助的社会成员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社会怨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第五，互联网的减压作用。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85亿人。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着两重意义的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互联网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运用得当，互联网则能够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有效减压、有效辟谣、有效批评、有效建议。

显然，如果能够将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之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有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是缓解。

主动正视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

记者：我们知道，“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前面我们说的最终消费率逐年走低等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如何化解社会焦虑情绪呢？

吴忠民：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

应当看到的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规范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社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显然，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就此而言，我认为，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目前猪肉价格首现环比下降；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

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记者：谢谢您。

解读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精神

8月4日上午，北京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党史党建部主任姚桓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解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主持人：各位网友上午好！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连日来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的热潮，“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举办系列访谈解读“七一”讲话精神，今天是访谈的第六场，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党史党建部主任姚桓教授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解读总书记“七一”讲话，欢迎各位网友积极参与。首先请姚老师跟各位网友打声招呼。

姚桓：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一般在我们系列访谈开始之前，总问一个问题，专家对总书记的讲话有怎样一个总体的评价，讲话有哪些亮点？对于您作为党史党建的研究者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姚桓：学习总书记“七一”讲话，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词：历史、现在、未来。总书记讲话对历史做了一个回顾，对现实的状况、我们的问题做了一个正确的分析，对未来做了一个科学的展望。我觉得通篇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这样一种精神。可以说，在新世纪、新起点当口，为我们党、为我们民族指明了方向。我总的感觉，讲话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通过学习，我确实感到鼓舞。

说到亮点，我的认识是这样的，所谓亮点就是对现实重要问题的一个聚焦和分析。这个亮点，不仅让人眼前为之一亮，而且心灵上要为之一震，受到启发。所以亮点对问题的针对性很强，而且对问题有

新认识，解决问题有思路、新举措，我觉得这些是亮点。可以说“七一”讲话是亮点纷呈。我们党90年历史上做了三件大事，过去也讲过，为什么说是亮点呢？突出了三件大事是为了人民，同时依靠人民。总书记“七一”讲话说了三个紧紧依靠，我们紧紧依靠人民，说了三次，完成了三件大事，就是救国救民、利国利民、强国富民，这三件大事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完成的。这确实是对历史的回顾，但有新意。

再比如说，总结我们的成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新提法。过去我们说中国特色伟大旗帜，包括一个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次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还有具体制度。说明什么？说明经过60多年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探索，我们的制度基本上成型了，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就，现在就在根本的制度、基本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完善，使人们对我们的前途更有信心。

还有对我们党现在面临的问题，我认为分析得非常的清晰，比如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这是对历史方位的一个定位，由此出发分析了四种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讲话比以往更加尖锐的摆在我们党面前，尤其把精神懈怠放在第一位，这是让人启发的。经过90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老党，能不能把我们最宝贵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而且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广大，这确实是一个亮点。

还有很多，比如党的建设科学化，我们十七届四中全会就提了，这次把它提到新高度，用党的建设科学化这样一个理念来统领党的建设，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要求。再比如说，我们党面临的任务方面，为什么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科学发展呢？提出了三个没有变。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还有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决定我们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主持人：网友也关注到总书记讲话中提到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要做到四个坚持，网友想问您，怎样理解这四个坚持，怎样做到这四个坚持？

姚桓：这四个坚持，首先是坚持科学理论，理论创新。理论上的科学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条件，非常的重要。其次，坚持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什么坚持人民、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能使我们党保持先进呢？我认为这里面有比较深刻的道理。就是人民群众的斗争，决定着历史，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所以，你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就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一致，坚持这个，我们党就能够保持先进。

再有就是做好干部工作，凝聚人才，这是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的一个组织保证。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所以你做好干部工作，我们党才能走在时代前列。

最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严治党，解决自身的问题，保持我们肌体的健康。因为党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和永远先进，共产党要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就要能够正确有效的解决自身的问题。我觉得“七一”讲话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举措。

主持人：在总书记讲话开头概括了我们党 90 年来带领全国人民做了三件大事，说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网友想问您，怎样理解这个论断，如何理解这里的伟大、光荣、正确这三个词。

姚桓：我非常高兴听到网友这样的提问，我觉得我们的网友作为新世纪的网友，他是思考，他是深思熟虑，他能够提出问题，这样交流特别的好。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三个词应该是老话，讲了多年，我觉得对这三个词，我们要以一个新的诠释，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解释。我现在的认识，就是伟大、光荣、正确，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宣传性的口号，它是有科学的、实实在在的内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伟大？我觉得首先人民是伟大的，阶级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是伟大的，我们党是阶级的人民的先锋队，可以说是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阶级，造就了伟大的党。同时，伟大的党又领导了伟大的阶级和人民，应该这样来理解。

为什么党光荣呢？因为党从事了中国历史上最艰苦、最艰巨的斗争，而且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和牺牲。有时候一讲到历史，我们就感到热血沸腾。中国革命牺牲了几千万先烈，其中有几百万共产党员，有很多是无名的烈士。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奉献了六位青年，所以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的革命战士，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杰出的民族英雄。为什么光荣，就光荣在斗争艰巨，作出了最大的奉献。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正确呢？我觉得这个理解也应该有新意。我们和历史发展规律，我们的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和中国共产党 90 年，和建党以前革命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的探索，他们同样是可歌可泣的，但是没有取得成功，这样一对比，就能够看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引导我们的事业胜利。

同时，我觉得这个正确，并不是说我们党不会犯一点错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党从事任何一个伟大艰巨的斗争，不可能没有一些失误。所谓正确就是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规律出发，从人们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总结经验，利用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武器，及时纠正缺点错误。应该这样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主持人：刚才您也解释了伟大、光荣、正确，实际上是需要党的自身建设来进一步保证和实现的，特别是在新时期越是这样。在总书记讲话里谈到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网友想请您谈一谈伟大工程的由来，以及这样工程的必要性。

姚桓：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应该说确实对我们党的建设历史的一个高度概括。应该说，有两个伟大工程，两个伟大工程是和我们党的历史上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相联系。我们党在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跟这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相适应，就是在党的建设上，也创建了两个伟大工程。可以说，党的建设上，两个伟大工程，就是两大理论成果在党的建设上实践中的一个体现、一个应用。这两个伟大工程，都有很大的创造性。

第一个伟大工程，就是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人人数少，农民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多数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所以党内工人成份不占多数，怎么样把我们党建成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一个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就是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注重思想建设，同时进行组织建设，把我们党的党员，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锻炼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是一个创举。

我讲个历史故事，周恩来曾经回忆，1940年他到莫斯科去，共产国际给他提出一个问题，说共产党老在山村、山沟里活动，离工人阶级太远，能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周恩来回答虽然我们在山沟里活动，我们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思想建设，能够把党建设成

工人阶级先锋性，当时共产国际听了以后为之大哗，不可理解，认为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一个难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怎样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在世界共产党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第一个伟大工程，创造性很多，包括三大作风，包括利用整风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包括团结——批评——团结的工作方法，这都是创作。

第二个伟大工程，解决的问题更艰巨，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对我们党提出的新要求。第二个伟大工程，是新的伟大工程，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伟大工程主线是什么呢？就是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因为是执政党，又走在时代前列，这个主线就抓住了党的建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纲挈领，围绕主线形成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布局。过去我们党的建设讲三个方面，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增加了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形成五大建设，就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还有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突出了什么？过去讲反腐倡廉是在作风建设中讲，这次把它单独提出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突出了反腐倡廉的长期性、艰巨性，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布局，能够贯彻实现伟大工程。

再比如说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用科学化来统领党的建设，还有一些新举措，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还有在基层组织和党员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我认为都是新的伟大工程的创造性。这是我的认识。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贯穿讲话，有一条是党建科学化这样的命题，网友想问您究竟如何理解党建科学化概念？

姚桓：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要理解党建科学化，首先对党的历史做一点回顾。党的建设科学化，首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在 1929 年古田会议决议中，针对当时红军党内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生活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東西，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要实现党内生活的科学化、政治化，最早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又再一次强调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我觉得它是有很强的针对性、时代性。因为一种新的理念，总是有新的实践所奠基和催生的。

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党的建设科学化呢？主要是为了深刻的认识党的建设规律。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把党的建设搞得更好。因为党的建设如同经济建设一样，它也是有规律的，你只有按照这个规律去自觉的加强党的建设，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些年来，我们党的建设不断的深入中央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推进加强党的建设的举措。比如“三讲”、执政能力建设的贯彻、保持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还有现在的创先争优，这一系列党的建设工 作，应当说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但是，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分析，有些东西还没有完全落实，同人民群众希望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党的建设，一方面要重视、要加强、要投入，但更重要的是讲规律、重实效，取得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实实在在的效果。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说我们思想建设、思想教育有没有规律？有规律。怎样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员掌握先进思想的特点，这就是一个把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结合起来，这就有了规律。组织建设有没有规律？我觉得也有规律。我们的干部工作怎么样做得更好，我们党员发展工作怎么样做得更好，怎么样使我们党员的数量发展和质量的提高达到一个辩证的统一，恐怕这也有规律。再比如说反腐倡廉有没有规律？反腐倡廉是一个艰巨的政治任务，但这个东西不能靠义愤，愤怒出诗人，但

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往往不正之风和腐败是伴随着一些新的改革举措出台而出现的，它结伴而生，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采取措施，但是这个腐败出现了。腐败的出现和采取的举措之间往往有一个时间差，我们怎样缩小时间差，提高反腐败斗争对腐败的一种分析的预见性，采取前瞻性的措施，防患于未然，建设一个惩治与预防腐败的体系，这也有一个规律。

我认为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用这个来统领党的各方面的建设提出要求，这是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取得实实在在的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

主持人：网友提了一个理论化的问题，提高科学化水平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需要党的理论创新。在新世纪新时期，怎样处理好坚持继承与发展创新的关系，关于外国经验与自主创新、民主与实事求是等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好？

姚桓：这个问题是很有深度的，我也感谢网友，也促使我进一步的去思考。我们在党建理论创新中，确实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的关系。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不是所有新出现的东西都是创新和发展。我觉得首先要明确坚持什么？继承什么？发展什么？创新什么。我认为坚持继承就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党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性东西。比如我们党根本性质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我们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我们的作风是三大作风，这些共产党安身立命的东西都要坚持，绝不能丢弃。这个丢掉了，就是弃其所长，自毁优势。发展创新是什么呢？在我们党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包括在组织形式、组织结构上，要作出一些大的改变。这个是发展创新，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辩证统一。我们做到这一点，就做到坚持但不守旧、不僵化，发展创新，但是不变质、不丢根，这样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在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中，我认为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把我們一些传统的東西赋予一个时代要求的新内容，比如贯彻群众路线，现在要坚持，我們在群众路线基础上，提出营造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这就是坚持发展和创新的关系。比如再有党内民主，我們也始终这样讲，但是我們有一个新认识，就是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把民主的重要性提到生命的高度，这也是一个创新。在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中，有两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是借鉴外国党治国理政的经验，同时是自主创新。这非常的重要。人类文明有相通的、相融的一面，比如外国在治国理政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权力的制约，防止权力腐败。西方政治学家提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对我們有启发，但是我們怎么解决问题呢？我們不照搬外国的方法，不照搬西方的模式，我們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我們怎么搞？我們搞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来授予权力，人们对权力进行制约。我們发展党内民主，而不是在党内造成派别活动。通过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来实现对权力的制约，这就是自主创新。一方面制约了权力，保证了人民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另一方面没有造成多党制三权分立造成的混乱和弊端，发扬了我们的优势。民主和实事求是也是我們坚持发展、继承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我們要发展和创新，不能仅仅靠个人的智慧，要靠集体的智慧。那么，怎么样集中集体的智慧，就是要发扬党内民主。刘少奇过去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实事求是是有赖于党内民主做保证，没有民主就不能保证实事求是。我們党有这个历史经验，凡是我們党民主比较健全的时候，就实事求是贯彻得比较好的时候。反过来说，如果民主遭到破坏，实事求是也不能够贯彻到底。我們要加强党的理论创新，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实要发挥党内民主，这非常的重要。

主持人：讲话里面提到党的建设科学化，提到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来聚集人才。网友想问您怎样理解“德”和“才”的关系。

姚桓：这个问题也提得非常好。德才兼备，应该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用人经验中，古人已经提出来了。比如说宋朝的司马光，大政治家，他说了一句话，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一个人的德要靠才去发挥，一个人的才要由德来统帅。古人看到德才的辩证关系，把德放在第一位。康熙皇帝说了一句话，先观人心术，再看其才学，若心术不善，才学无用。在封建社会，德才内容跟我们不一样，这个思想是可取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德才兼备要以德为先。你没有一个高尚的品德，没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你有才也不能为人民服务。所以这次“七一”讲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充分发挥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对才能的引领作用，就是我们干部有一个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可以在实践中，从人民的需要出发，锤炼本领，增长才能，对我们的干部，尤其对青年干部非常的重要。

“七一”讲话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培养造就青年英才，这个非常的深刻。青年英才，我理解就是青年中杰出的人才。因为中外人才史都证明这一点，很多人是在青年时期就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成为了青年英才。我们党一大的时候，毛泽东同志 28 岁，最小的一大代表 19 岁，历史上很多人青年时期就成为了杰出的事业骨干。另外，在改革开放重要的关键时刻，今后这二三十年，是我们建设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关键时刻，正是我们党干部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接力棒交到了青年一代手中，所以提出培养造就青年英才，对我们青年干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就是要把握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宗旨，以德领才，在事业中建功立业，非常令人鼓舞。

主持人：网友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在讲话里面提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网友想请您结合历史和现实谈谈如何理解群众路线问题。

姚桓：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传家宝，现在贯彻群众路线，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应当说，现在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多的。我觉得有些干部没有很好的贯彻群众路线，甚至发生了扭曲。比如说脱离群众的实际需要去谋求政绩，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比较严重，甚至极个别的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欺压群众，这种现象都出现了。我觉得在今天仍然要把群众路线当做我们根本的工作路线，把它当做我们立党之基、执政之源，始终加以坚持。

但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从认识上，从世界观的高度要解决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特别是要明确我们权利观的一个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权由民所赋，共产党的权利是老百姓给的，人民给的，由权由民所赋，达到权为民所用。既然权利是人民给的，你的权利就不能以权谋私，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从思想道德方面要提高，要引领我们的行为才能贯彻群众路线。

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制度保证，包括我们的干部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要强调民主，强度选拔人民信任、拥护、赞成的这样的干部，选拔上来以后，行使权利还要受到人们的监督，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保证权利运行的预期。一个是思想教育，一个是制度保证，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够在新形势下更好的贯彻群众路线。

主持人：感谢您和网友的交流，今天的访谈马上就要结束了，相信姚老师的解读能够给网友理解“七一”讲话带来很多帮助和启发。

再次感谢您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姚桓:谢谢网友,谢谢主持人。

中国道路与党的创新精神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党的事业充满了活力，使民族复兴获得了新的强大生机。这条道路的开辟和拓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就必须不断发扬创新精神，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不断创新的过程。立足于实践，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我们党解决了用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问题。接下来，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国便成为我们党需要解决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解决这个历史课题，也需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外国经验。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们党进行了长期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但这一探索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功，其间还发生了失误、出现了曲折。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如何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国这一问题继续不懈探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我们党加深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

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党的历史任务已从“救中国”转变为“发展中国”，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都要围绕这样的历史任务来展开。要解决发展中国的问题，走出一条新路，就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突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摆脱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创新举措。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以后，实践的脚步在加快，理论创新的脚步也在加快。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上作出了独创性贡献。这两个理论成果的相继形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逐步拓展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

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一个明确的概括，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再次重申了这个概括，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概括，包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提出了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同时也确定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揭示了我们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体现

胡锦涛同志指出，总结 90 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之一，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辟和拓展的，它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运用、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基本国情的科学把握、对时代特征和世界形势的科学判断，同时也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贯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这条道路的创新及其所体现的生机活力是多方面的。

将社会主义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融为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使其成为一体化的事业。这条道路的创新性，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始终根据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目标要求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始终从现代化的实现来考虑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巩固。正是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在避免社会动荡和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才能使现代化的成果逐步惠及全体人民；正是因为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凝聚起民族力量，不断增强人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与信念。

通过改革开放激发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显著特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激发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力，是这条道路创新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伟大创举；把中国发展与世

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鲜明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充分调动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也更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对接，使中国的发展有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借鉴和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文明成果创造了条件，为人们的观念更新和思想飞跃提供了动力。

把远大理想现实化，以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体现发展的过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更加现实化。这条道路所确立的目标体系，从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到初步达到小康，再到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使党和人民有了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而且使理想目标的追求成为贴近现实的历史活动，成为党和人民每一天都在进行的生动实践。这样的目标体系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长期性、过程性的理解，也有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地致力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伟大事业。

把民族精神作为社会动员的重要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含着强烈的民族精神。这条道路的开辟，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得到不断的焕发和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爱国主义激励人们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身于促进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事业，献身于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事业。这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基础，而且也使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有了具体的实际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崇尚团结、维护统一的价值取向，使其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国家发展进步的基本要求和行为准则。

坚持和平发展，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以发展为主题并在维护和平中实现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基本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创新发展途径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强调坚持和平发展，既要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要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含的创新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蕴含的创新精神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突破陈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以不断解放思想为先导、以突破陈规为前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全过程，也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彻底摆脱“两个凡是”束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与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突破陈规紧密相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在进一步拓展中，无论现在还是未来，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作进一步探索。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使我们在理论上有更多的发展、在实践中有更多的新创造。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我们党创新精神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明确强调：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

真理，并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既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走自己的路，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和经验。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不同，无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实现现代化，其道路也必然不同，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国家的道路。我们党依据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对世界多样性的尊重。当今世界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都各有其特点和经验。我们充分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绝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但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们。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绝不能照抄照搬。

从总结经验中形成新认识、作出新判断。从总结经验中获取新的认识、作出新的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总结经验，包括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两个方面。我们党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作出的科学总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历史依据；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作出的科学总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现实依据。正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中，我们党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面对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我们党始终要求自己站在时代发展前列。我们党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

的新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从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执笔：秦刚）

